

中華管理評論 國際學報

Web Journal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2006年2月第九卷一期 • Vol. 9, No. 1, Feb 2006

新階段 新思維 新路子 ——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

周文騫

<http://cmr.ba.ouhk.edu.hk>

新階段 新思維 新路子

——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

周文騫

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進入新的階段

祖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港澳同胞積極參與，尤其在珠江三角地區與長三角地區經濟崛起中，同港澳台經濟合作所取得的顯著成效更加輝煌。二十六年過去了，世界經濟形勢與國內經濟建設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用新的視角、新的思維去觀察、分析新的情況十分必要。

首先，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使參加 WTO 後的中國經濟更深地納入世界經濟大格局。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的市場成爲全球統一大市場的構成部分，全球的市場我們可以進入，我國的市場也同時對全球開放。我們既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獲得物質商品與非物質商品大規模自由流動帶來的好處，但也會產生國外、國內兩個市場中的更大範圍、更激烈的競爭。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產業結構體系納入全球分工與產業鏈，如何爭取在產業鏈中居於有利位置，擺脫當前在全球分工中處於垂直分工的末端成爲迫切的任務。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產業帶的佈局、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更需要與國際接軌，這對於地處大陸東部沿海三個最重要的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珠三角、長三角與京津冀經濟圈的產業佈局與中心城市建設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因爲這些地區和城市對外經濟的依存度要遠高於大陸其他地方，它們的興衰與能否按經濟全球化的節拍運作息息相關。

其次，世界範圍內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興起，促使人類社會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 1996 年發佈的題爲《以知識爲基礎的經濟》報告中，對知識經濟的概念作了界定：“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依靠資本、勞力、土地等物質資料的投入，而知識經濟主要是依靠人力資本。知識增值的本質特徵是“創新”，創新是知識發展與進步的原動力。

20 世紀後期以信息技術爲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到來，導致了世界又一次產業革命，推動了新一輪的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和產業的大轉移，這必然會爲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帶來難得的機遇。信息技術的作用不僅僅是它的廣泛應用

性與其本身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產業，而在於它的深透性、交叉複合性。它可以融入各個領域，使原有的學科部門與三次產業在深度、廣度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它是科技革命、知識經濟中的旗艦。要高度重視信息技術的先導作用，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推進信息化。

知識經濟的出現，在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形成了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兩個概念。第一次現代化是以工業化爲特徵的；第二次現代化則是以知識化、信息化爲特徵的。當前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面臨的是雙重任務的疊加，既要完成工業化，又要進行知識化、信息化。長三角地區目前處在工業化的中後期，比全國現代化進程有所超前，正是一個關鍵時期，兩次現代化任務處理得好、結合得好，不但不會延緩，而且可以使兩者互相促進，加速現代化的實現。

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的經濟合作必須把握全球經濟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利用經濟全球化深入與知識經濟時代到來所引起的國際產業大調整、資本大流動、技術大轉移，彌補國內資本、技術、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短缺，實施產業升級、技術革命、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第三，中國大陸正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前進。在全國人民不懈的努力下，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經濟發展“三步走”的設想，解決了人民生活的溫飽問題，順利地在大陸範圍內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但它只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中一個重要階段，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全面建設小康相對進入小康社會是一個深化過程，它不是局部的、單純經濟上的概念，而是整體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乃至生態的概念。除了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上要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3000 美元，進入中等國家收入水平行列之外，尚須注意人民精神生活、生態環境的改善，全面建設小康追求的社會進步，物質、政治、精神、生態文明共同發展。同時，將更關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性，縮小城鄉、地區、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當全社會向著新的目標邁步的時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進入了新的階段，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不能不受到這種變化的制約，從而使合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主題思想是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思想同全面建設小康是一脈相承的，是它的繼續發展與深化。和諧社會思想

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它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一切工作，包括經濟建設與發展都是為人民謀福利。社會主義在促進人自身和諧、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同時，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的和諧，那些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經濟活動必須受到遏止，經濟發展要同自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相適應。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率，這是經濟合作過程中的首先要遵循的原則。

構建和諧社會也包含著人與人關係的和諧，人的行為與關係通常同利益有關。由於人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對利益的佔有也有所不同，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中，我們並不諱言利益上的矛盾與衝突，關鍵是如何認識與協調它們，營造經濟利益合理分配的機制。以往經濟合作較多注意經濟上的投入與產出、效率的高低，卻忽視了利益分配上的社會公平。要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物質生活資料的豐富，但也需要設法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使人民群眾享有經濟公平。

構建和諧社會還涉及社會內部之間的和諧，隨著生產要素與人的聚集、流動程度的加大，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會不斷產生矛盾與摩擦，不同社會階層與社會群體間也會因各自利益不同引起衝突。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怎樣把矛盾控制在維持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範圍之內，使社會內部各個不同階層都能享有社會發展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構建社會主義社會除了經濟公平外，還孕含著社會其他領域的公平，諸如教育權利、勞動就業權利、醫療權利、自由居住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等。這種公平社會環境的建立，自然與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相關，但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也不能只是想到以小博大，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利益。因為任何一種經濟合作活動與任何一個企業都生存於社會大環境中，而一個和諧社會環境也會極大地促進企業的發展。

重新審視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的有利條件

時代的變遷，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們必須用與時俱進的精神、嶄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我們會發現以往合作中享有過的優惠條件、採取過的一些手段已經過時，或正在消失中。

廉價的勞動力難以繼續

去年以來，從珠三角、閩東南等地區開始出現了“民工荒”，並逐漸向長三角地區延伸。這是勞動力供需關係中勞動力供給不足所引起的嗎？全國勞動力市場總的形勢中，勞動力的來源是非常充分的，據國家有關方面公佈的數字，今後三年內，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勞動力多達 2400 萬人，而年度提供的就業崗位僅為 1000 萬人，巨大的缺口造成的就業壓力相當嚴峻；目前全國大約有 1.2 億農民工進城，同時至少還有 1.5 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等待轉移與進城務工。所以全國勞動力供應可以說是無限的，在總體上不存在稀缺的問題。

當前出現的“民工荒”主要表現為廉價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市場上買方出價太低，賣方要價要求高一些，買賣就不成功。“民工荒”最嚴重的地區是東南沿海地區，那裏是加工業聚集之地，不少是通過招商引資進來的港澳台企業，主要從事出口導向型經濟，產品以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這些企業的利潤主要不是來源於先進技術設備與高新技術，而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也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經濟始發時吸引外來廠商的地方。但是時過境遷，隨地區經濟翻番地增長、投資者利潤成倍地上升，為此作出重大貢獻的民工收入依然在原地踏步，其反差極為明顯，財富分配中的矛盾也突顯了出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12 年內珠三角地區外來民工工資人均每月只增加了 68 元，人均月工資收入只有 600 元左右，和他們父兄輩改革開放初打工時的收入水平幾乎一樣。長三角地區外來打工者收入要高出 200 元左右，也好不了多少，由於生活成本的上升，象杭州市人均最低生活費用已達到了 700 元。

近幾年來國家政策向“三農”傾斜，農業稅減免，純農業經營戶獎勵補貼增加，農產品價格以及深度加工開發程度提高，農民收入增長也較快，因而有一部分進城外打工的農民工中出現了“返農”的現象。同時，內地一些勞動輸出的經濟欠發達省份經濟也加快發展，就業機會增多；民工背井離鄉到外地打工，收入不高，文化背景與生活習俗又不同，而且還要受到人身歧視，比較起來，不如就地打工，情況明、人頭熟，生活成本還會降低，以至出現了內地企業與沿海企業在招攬民工中的激烈競爭。

“民工荒”，有的打工者說成是“民工慌”，慌的是工資低而勞動強度高、生活環境惡劣；慌的是工資得不到及時發給，甚至長期拖欠；慌的是應當享有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得不到落實；慌的是那些計劃經濟時期留下來的歧視性規則依然存在。民工的工資過低，加上權益保障不足，促使

“民工荒”的現象蔓延，長三角不少縣市的企業，出現了不敢承接出口訂單、開工不足，甚至還到車站“搶”民工的情況。

廉價勞動力曾經是吸引港澳台投資者到長三角地區參與經濟合作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以壓低勞動力價格、犧牲民工利益來維護企業發展的行為是不能長久的。據統計目前大陸的基尼係數為 0.47，有的專家估計已達到 0.49，接近國際公認的 0.50 的危險程度。就全國來說，大概占 5% 的最高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份額為 20%；而大概占 5% 的最低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份額不到 1%。兩者收入差距為 34 倍。而在最低收入人群中民工無疑是處在社會的最低層。這種狀況同構建和諧社會是不相適應的，和諧社會是人本社會，它的發展與進步必須建立在充分調動人的積極基礎上，低工資、無保障，連維持最低生活水平都困難，還談什麼積極性，從而造成和諧社會動力機制缺損。更加嚴重的是長期分配上的不公，民工收入不能和社會經濟發展同步，享受不到改革開放取得的碩果，必將導致社會不穩的局面，一旦矛盾激化，對社會造成的損失不堪設想。當務之急是要儘快建立社會公平的利益平衡與協調機制，讓民工這個弱勢群體在分配上的經濟利益得到合理的實現。善待民工，提升民工的最低工資線，改善民工社會勞動保障體系已成為長三角各地政府的重要政策，上海已提出“應放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做法。港澳台在長三角地區的企業應適應形勢變化，及時調整產業與產品結構，以引進技術、改善設備、推進機械化程度，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增加效率來彌補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優惠的稅制即將消逝

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一直以來是大陸吸引外資和港澳台投資的一種手段；但是對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分別實行的兩套稅制，造成了不同企業間稅負的極大不公平。據專家測算，名義上企業所得稅率為 33%，實際上外資企業的平均稅負只有 10%-13%，而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則在 22%-24% 之間，國有大中型企業稅負更高達 30%。

內外資企業稅負上巨大的差別，引起了一片鳴不平的聲音，認為現在在外資、港澳台企業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而內資企業則還達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公平、公正，稅負上巨大差別顯然有違這個原則。而 WTO 規章制度同樣也要求企業之間公平待遇，稅負不公平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慣例，在全球範圍內是鮮見的。

對流入我國的 FDI 來說，開放初期大陸的優惠稅制同廉價勞動力一樣具有吸引力，“兩稅合併”，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併、統一後，稅率估計在 25%-28% 的範圍內。除了統一實行法人所得稅制外，其他一些優惠條件也會相應作出調整。如：基本工資實行稅前據實扣除，不再實行計稅工資做法；形成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新格局，用“特惠制”取代“普惠制”，以往只要進入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企業都可以享受 15% 的稅率，改革後只有高新技術產業或投資於西部地區才可以享受 15% 的所得稅優惠。

據媒體披露，包括摩托羅拉、西門子、東芝、三星等 54 家國外大企業聯名上書政府相關部門，要求將對外資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延長 5-10 年，有些學者與部門負責人也擔心“兩稅合併”會對吸引外資與港澳台資本帶來負面影響。但稅制改革的大方向已定，不過是實施的時間問題。事實說明，在長期“普惠制”的情況下，無助於大陸先進技術的進入與產業層次的提高，相反勞動密集，技術含量不高的投資卻大量進入。港澳台的企業家在思想上要有充分準備，這次稅制改革，一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二是同國際慣例相接軌，三是今後招商不宜把精力放在優惠的稅收競爭上，而是放在改善投資環境、吸引高新技術產業上。為了減少境外投資者所受的影響，稅制的優惠將實行過渡期，增值稅與所得稅兩大稅種的改革也將同步進行，這都是在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所考慮的內容之一。

豐富、低廉的土地資源供應走到盡頭

“招商引資，土地先行”，以低廉的土地供應贏得港澳台投資商的青睞已成為各地政府的法寶。長三角經濟發展中也不例外，地方政府競相以低價格的土地供應作為競爭手段，一段時間內，“圈地”之風愈刮愈烈，亂占濫用耕地的現象觸目驚心。無序地推進城鎮化，盲目興建各類開發區，甚至還出現了為滿足投資商要求，壓低地價，大量出讓土地，有的竟然還以“零地價”來招商。還有的投資商佔有了數量可觀的土地，占而不建，對閒置的土地待價而沽、溢價轉手，實際形成了以投資為名的土地投機。

其後果是土地資源供應迅速衰竭，本來我國土地資源十分有限，人均土地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耕地面積從 1959 以來幾乎呈直線遞減，其中 1996-2003 年的 7 年內淨減 1 億畝，占耕地面積的 5%。浙江省的耕地面積占全國 1% 多一點，自改革開放的 1979 年以後，減少的耕地面積達 726 萬畝，相當於 2003 年年末實有耕地面積的 30.4%，2001-2003 年，平均每年減少耕地 58.45 萬畝。如再不加以控制，10 年之後，浙江省將無可供應之地。經濟

發展、對外招商引資，大量消耗了土地資源，矛盾十分突出，靠過度掠奪土地資源，犧牲子孫後代利益來獲取眼前利益的做法是難以為繼的。

土地佔用、出讓中的低成本、高收益，引起地方政府對佔有土地的衝動，他們借此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提高發展經濟速度，打造政績工程。其背後卻是土地收益大量的流失，違規出讓土地行為盛行，如該有償出讓的變為行政劃撥，該招標拍賣、挂牌出讓的變為協議出讓；還有劃撥土地、集體土地通過非法渠道入市，擅自減免地價，不依法追繳土地出讓金等等。凡此種種，都涉及到土地出讓收益中的利益分配問題，據浙江省一項調查表明，被徵用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 2 到 3 成，企業占 4 到 5 成，村級組織占近 3 成，而失地農民只占了半成到 1 成。分配不公中損害最大是失地農民，現在全國已達 4000 萬人，其中長三角地區的蘇、浙、滬總失地農民不少於 500 萬，占了全國的 1/6 以上。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背井離鄉，為生計而奮鬥，在補償等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夠健全情況下，約有 10-15% 左右的失地農民淪入了貧困人口隊伍。

對於上述征地中的弊端中央政府頒佈了一連串政策措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04 年 10 月份公佈的《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決定》指出要從我國國情出發，貫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並針對當前土地管理中突出的問題，提出了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具體措施。為同中央政策相呼應，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各市也紛紛制定了相應的“有保有壓”規定，如杭州市規定不符合產業政策、耗地量大、污染嚴重、低水平重複建設項目，堅決停止土地供應；對產業政策鼓勵範圍的項目則實行優先供地。同時還對採用集約用地的企業進行獎勵。寧波、嘉興等地還提高了投資商准入的門檻，提倡“零用地招商”（不耗用工業用地指標），把項目科技含量、規模水平作為投資的重要條件。上海市表示要大力增加土地整治力度，加快盤活工業開發土地的存量，對投資質量差、投資量不足或長期“開而不發”的項目，或是採取限期提升投資量，或是實行項目退出；對已經批准兩年以上仍未開工的工業園區土地，要堅決收回。

鑒於土地出讓價格與征地補償費普遍偏低的現實，將充分運用價格機制抑制多占、濫占與浪費土地的現象。今後土地價格應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與土地價值，反映中國土地資源稟賦不足的情況，對經營用地要由市場決定價格，實行招標、拍賣、挂牌出讓；並不能以低於國家規定的最低價標準協議出讓土

地，嚴禁低價、變相低價與“零地價”出讓土地。現行農轉非土地徵用制度有很大缺陷，有人說是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征地，然後用高加價辦法在市場出售，對農民集地用地的所有權缺少保障，不尊重農民利益。應該允許農民集體用地的使用權按法律規定與程序在土地市場上流轉，這是打破政府壟斷土地市場，增加市場供應主體，促使土地交易市場化的關鍵。

面對現實，調整心態，改變投資戰略，這是港澳台投資商應對長三角地區地價上漲，土地有限供應的積極對策。

環境保護愈趨嚴厲

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前進，經濟繁榮背後卻湧現出粗放型經濟增長給資源環境帶來的沉重壓力，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生態危機正向我們逼近。在這中間，大陸外資企業的一部分是屬於高污染企業的轉移，新建企業中也有不少是污染嚴重的企業。在立項中由於缺少環境評估，往往忽視了企業工程上馬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經濟的發展，對此又視而不見，放鬆執法力度。先治理後建設變為邊建設邊治理，或者變為先建設後治理，最後卻成為不治理，聽任環境日益惡化。

長三角是全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危機最早呈現的地區。以水污染為例，據 2005 年 1 月份監測顯示，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中劣類水質占 28.4%；全國 52 個主要湖泊中已有 26 受到嚴重污染，75% 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與 1980 年相比，2003 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增加了 2 倍，約有 1/3 工業廢水與 2/3 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中。浙江省 2000 多萬城市人口，產生污水 300 萬立方米以上，而處理率僅為 44%。長三角地區的主要水資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以太湖污染最為嚴重。環太湖區域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浙江的杭、嘉、湖，江蘇的蘇、錫、常、鎮江 8 個大中城市以及 30 個縣（市）各種污水年排放量高達 32 億噸，為全國的 10%，而且已出現了因水體污染而導致水質型缺水，“長在太湖邊上沒水喝”，這就是最真實的寫照。此外，工業廢氣的排放，廢渣的處理大多沒有很好治理，“一方治理多方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邊治理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言）。

據有關專家估計，因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直接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高達 6000 億元以上，占全國 GDP 總量的 6%。生態環境惡化，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阻礙了全面建設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步伐，威脅到人民的生存與發

展。對此，國家極為重視，今年1月18日國家環保總局通報了30個嚴重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的建設項目，同時責令其立即停建，並將對其重罰，還建議對直接責任人依法給予處分。這些違法上馬的企業幾乎全是投資巨大的電力項目，有的還經國務院有關部委批准的，總金額達到6000億元。加強重大建設項目的環境評價保護，從源頭上制止污染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可持續發展的一大舉措，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輿論稱之為“環評風暴”。浙江省也對投資1.7億元的永利熱電有限公司等15個建設項目未履行環評制度等有關規定，依法作出嚴肅處理。

現今長三角地區的“綠色GDP”、“循環經濟”、“生態經濟”已浮出水面，成為當地政府最關注的問題之一。2004年全國首份《產業效能指南》在上海出台，確定今後不僅以產值等指標衡量產業，而是加入了資源、用地、環保等指標因子，高能耗、高污染、占地大的企業將拒之門外。江蘇省已制定建設生態省的規劃，明確要求將環境、資源等方損失納入“綠色GDP”的經濟統計體系，而且對800多家重污染企業實施了清潔生產，還設立了循環經濟試點100個。浙江省從去年開始，已將“綠色GDP”及萬元產值的主要原材料、水、能源消耗，“三廢”排放量4個新指標列入國民經濟核算，以全面評價可持續發展狀況。湖州市率先變革了幹部政績考核辦法，不再以GDP增長為唯一指標，而加上了環境保護、民生質量等內容；一些幾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因不符合環保標準，未能進入，實際已把過去“招商引資”變為“疊商引資”。

長三角地區正走向“生態經濟”，用“綠色長三角”指導經濟發展。在同港澳台經濟合作中，一方面原有企業中，污染較大的應當及時治理達標，加大清潔生產的步伐；另一方面準備進入或新建的企業，應認清大陸環保要求愈趨嚴厲的形勢，立項時先進行環評，投資時要控制排汙，制止外部不經濟現象，將污染造成的損失推向社會。

經營成本逐節上升

從經營中的人力成本來看，1979年以來，長三角地區企業管理層中的白領階層工資大約上升20倍左右，加上獎金等其他物質鼓勵手段，白領階層的收入上升大約30倍左右；企業中的工程技術人員收入也大致相仿。一些骨幹、精英分子的收入上升更快，接近港澳台境外企業的同類人員收入水平。

港澳台企業在開發區、工業區用地的土地成本也成倍、翻番的上漲；在城市中的商務房、管理人員的住房價格，從 2000 年到現在，至少上漲了一倍，象上海、杭州、寧波等城市的中心地段或環境較好的區塊，商品房每平方米價格幾乎都在萬元以上，商務辦公樓每平方米價格在 2 萬元以上者相當普遍。如果要在區位、環境良好區塊買地造屋建房，樓面價在 8000 元以上者並不算是高的。房價直線上升，員工的報酬或房貼也要同步，這又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現在有的港澳台企業逐漸從城市中心區或開發區撤出，搬遷到市郊或更遠的地區，這也是為了節省成本無奈之舉。

此外，水、電、氣、物管費用、城市公共費用支出也上升很快。現代服務業與信息產業的發展既促進了效率，但也增加了經營成本，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增加抵不上經營成本上漲在企業中也是經常會發生的。

長三角地區同港澳台經濟合作的新思維新路子

在經濟合作中出現過的有利條件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正在逐漸或已經消失，因此在合作中要用新的思維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加快同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台經濟合作

大陸同港澳台經濟合作最早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至今其規模也排在首位，但長三角地區正迎頭趕上，發展勢頭異常迅猛，這是同該地區的經濟實力，經濟社會環境相聯繫的。

長三角地區是大陸經濟實力最強，貢獻最大的地域。通常人們所說的長三角是指由江、浙、滬 15 個城市組成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的行政區域。包括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泰州、南通、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即上海加上蘇南、浙北，2003 年 8 月浙江的台州也被正式吸納。這個地區土地面積為 10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 1.2%，2003 年人口為 7608 萬，占全國 5.89%，但卻貢獻了全國 GDP 的 19.5%（22774 億元），完成了出口額的 31.6%（1386 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的 47.8%（255.8 億美元）。2004 年長江三角地區經濟的貢獻已超過全國總量 21.1%，財政收入占全國 25%，出口占全國 33% 以上；人均 GDP 為 3514 千元，按現行匯率折算，已突破 4000 美元大關。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 35 個城市中有 10 個在長江三角地區；剛剛公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按綜合實力排名，長三角地區有上海、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列位前 10 名。

按綜合實力排位的全國百強縣中幾乎占了總數的一半。長三角地區還聚集著近百個工業產值超過 100 億的工業產業園區，世界 500 強企業中有 400 多家已進入。從（附表一）中可清晰地看到在大陸最主要的經濟區實力對比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無疑是雄踞榜首的。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各經濟區核心城市中，上海的全國最大經濟中心地位已經確定，更以大陸經濟的火車頭與國際化大都市的身分，帶動了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的發展。參見（附表二）。

2003 年三大經濟圈主要經濟指標對比 (附表一)

地區	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三次產業增加值(億元)			產業結構(%)			人均生產總值(元)
		一產	二產	三產	一產	二產	三產	
長三角	22803.32	1126.89	12414.79	9261.64	5.00	54.40	40.60	29973
珠三角	11453.10	547.84	5962.10	4943.16	4.78	52.06	43.16	36797
京津冀	10373.47	816.80	4727.50	4828.78	7.90	45.60	46.50	17335
合計	44629.89	2491.53	23104.39	19033.58	5.60	51.80	42.60	26717
全國	116694.00 (9.1%)	17247.00 (2.5%)	61778.00 (12.5%)	37699.00 (6.7%)	14.8	52.90	32.30	9030

地區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	進出口總額(億美元)	出口(億美元)	實際利用外資(億美元)
長三角	10589.08(38.9%)	6923.75(10.8%)	2737.00(56.2%)	1386.85(50.1%)	255.77(43.3%)
珠三角	3749.44(27.3%)	4048.28(14.1%)	2713.87(28.1%)	1451.39(28.9%)	169.34(12.7%)
京津冀	4603.96(25.2%)	4234.65(16.4%)	1068.14(30.2%)	371.56(29%)	48.47
合計	18942.48	15206.68	6519.01	3209.80	473.58
全國	55118.00(26.7%)	45842.00(9.1%)	8512.00(37.1%)	4384.00(34.6%)	535.00(1.4%)

2003 年三大經濟圈核心城市主要經濟指標比較 (附表二)

地區	核心城市	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三次產業增加值(億元)			產業結構(%)			人口(萬人)	人均生產總值(元)
			一產	二產	三產	一產	二產	三產		
長三角	上海	6250.81 (11.8%)	92.98 (2.3%)	3130.72 (16.1%)	3027.11 (8%)	1.5	50.1	48.4	1341.77	46718 (11.2%)
珠三角	廣州	3466.63 (15%)	104.14 (-0.3%)	1504.89 (21.4%)	1857.60 (11%)	3.0	43.4	53.6	725.19	47900 (14%)

京 津 冀	北京	3663.10 (10.7%)	95.64 (3.3%)	1311.86 (11.9%)	2255.60 (10.3%)	2.6	36	61.4	1148.80	32061 (9.4%)
	天津	2386.94 (14.5%)	89.70 (6.1%)	1212.34 (17.8%)	1084.90 (11.5%)	3.7	50.8	45.5	926.00	25874 (13.8%)
地區	核心城市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億元)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億元)	進出口總額 (億美元)	出口 (億美元)	實際利用外資 (億美元)				
長 三 角	上海	2452.11(12.1%)	2220.64(9.1%)	1123.97(54.7%)	484.82(51.2%)	58.50(30.1%)				
珠 三 角	廣州	1157.77(14.7%)	1494.27(9%)	349.44(25.1%)	168.89(22.6%)	30.64(15.5%)				
京 津 冀	北京	2157.10(18.9%)	1916.70(14.5%)	684.63(30.4%)	168.52(33.6%)	21.47(19.8%)				
	天津	1046.72(29%)	1074.05(14.1%)	293.71(28.7%)	143.74(24%)	17.06				

資料來源：《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長三角地區的對外開放勢頭強勁。不單在進出口貿易、對外經濟合作中領先全國，而且在對港澳台經濟合作也邁開了大步，取得了成效。到 2004 年底為止，江蘇省已累計批准台資項目 11882 個，合同利用台資 204 億美元。現常住江蘇的台商有 5 萬人，台企員工 250 萬人；台屬 80 萬人。以蘇州為中心的蘇南地區已成為台資聚集、台商安居的寶地。杭州也制定了相應的對策今後將把吸引台資作為重點。

長三角地區所屬政府，根據全面建設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大目標，理清思路，確定了今後經濟的發展戰略，在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要調整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在對外招商引資上出台了產業投資政策與相關的優惠條件。政策的透明性為港澳台資本進入減少了信息失真與不對稱所造成的損失，更有針對性地進行經濟合作。

長三角地區當前正合力推進經濟一體化。“同飲一江水，同唱一首歌”，在七個方面打造一體化的互動圈，即：交通圈、金融圈、科技圈、人才圈、商貿圈、安全圈、旅遊圈，從而使長三角地區內部資源共享、經濟聯動發展。港澳台投資商投入這個互動圈同樣也會獲得高起點的融合所帶來的利益。

長三角周邊地區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為核心區域提供了廣闊的腹地與市場。長三角地區如果從其經濟關聯與行政區劃關係來講，其區域範圍可擴大到兩省一市，也就是把整個江蘇省、浙江省包括進去。這兩個省的經濟發

展水平與速度直逼上海，江蘇、浙江在 GDP 總量上分別占全國第二、第四位，雙雙超過了 1 萬億大關。而且兩省是全國相對的富裕地區，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與收入也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為長三角核心區的經濟發展在空間上開闢了廣闊的腹地，而且也創造了一個無可多得的良好市場。長三角地區的產業可以同周邊地區互動，產品相當部分可以在這裏消化。這類經濟圈地域的上的優越性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罕見的。

長三角地區在加速基礎建設的同時注重制度建設，硬、軟環境改善齊頭並進。為了打破經濟發展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的制約，江、浙、滬都在全力改進。以交通為例，三地都對公路網規劃作了調整，打造城市間的“三小時的交通圈”；同時還發展主要城市間的快捷現代化交通網絡，包括滬杭、滬寧之間都要形成“一小時交通圈”。寧波至上海的跨海大橋建成，也會使周邊的百餘鎮城納入 1 小時車程的輻射區。以上海港為中心的組合港思想確立後，上海港及其後建的大、小洋山深水港，寧波港、舟山港聯成一體，成為全國最大的國際化港口，為同港澳台經濟往來提供了便捷的海上交通線。

在經濟體制上，浙江、江蘇都創造過“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在全國享受到了體制改革先發優勢，現在它們也不停步，繼續進行深化，浙江在充分發揮非公有經濟作用上，江蘇在打造外向型經濟上各顯特色，在對外開放上，長三角地區是政策最透明、最寬鬆的地區，而且也是腐敗最少、辦事最公正的地區，投資環境安全，社會治安全國最佳。

把握為非公有制經濟松綁的大好時機

今年 2 月 22 日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共 36 條，分為 7 個方面，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政策性闡述與規定。在國內尤其是個體私營經濟層面中間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一片喊好聲，稱讚這個意見為非公有經濟“正身”、“放開”，為非公有經濟提供了無限機遇，並由此走上了新的起跑線。

“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馬克思語），市場經濟的主體應當是平等的，市場經濟規律的核心是平等，即不同的主體在市場中都必須遵循相同的規則；如果在競爭的起始點上，市場主體間就沒有平等的權利，那麼就遑論平等競爭。所以文件中規定的要“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行公平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又一

重大步驟，體現了市場經濟下不同行爲主體的平等性。從而爲非公有制經濟持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既有了充分發揮非公有經濟的潛力和創造力，也同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相一致。

長三角地區還是非公有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浙江、江蘇在個、私經濟的發展上名列前茅。以浙江省爲例，2003年來，全省GDP總量中個私經濟的比重爲53%，在工業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出口創匯4項指標上，已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非公有經濟已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工業化城市化的生力軍、就業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最大來源、繁榮市場的主體力量，也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與者與支持者。

長三角地區的個私經濟不僅數量多，增長快，而且規模提升更快，它們已完成了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進入資本加速成長期。去年年底浙江省經工商登記進入個私領域的資金達到4404.71億元，增長率爲31.35%，比2003年底淨增1051億元。目前浙江總資產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有903家，註冊資金億元以上的218家，還有私企集團672家。估計在省外投資總額約有6000億元，還有在市場中遊動的閒置資金8000—1萬億元左右。

長三角地區非公有經濟現正借文件出台之機，大舉進軍以往被公有經濟壟斷的領域，如金融、保險、電力、電訊、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但是，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巨大、回收期長，光靠非公有企業獨立的承擔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真要向大型、特大型的項目如電訊、移動通訊進軍，必須有外來資本特別是港澳台資本的合作。

非公有經濟經過20多年的發展。第一代創業者垂垂老矣，而且文化水平、管理知識也難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私企換帥、交班的“換代潮”正在長三角地區掀起。新一代的掌門人大都受過良好教育，不少還出國深造過，屬於知識型的企業家，他們的經營理念、法治精神，更貼近市場經濟。這是大陸非公有經濟管理由過去的人治走向法制的重要的一步。

港澳台的投資者有同大陸受中華文化的影響熏陶，思維模式、行爲方式大致相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長三角地區是非公有經濟的發祥地，私營經濟無論產權結構還是在以市場爲導向的經營方法上都貼近港澳台企業。所以港澳台投資商加快同長三角地區的非公有經濟合作正當其時，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本、管理、信息、商路等優勢；另一方面可以借文件公佈爲大陸

杭州	1156	0.316	100368	2406	409	2.32	6.21
寧波	1058	0.342	23248	2072	354	1.93	5.03
嘉興	1265	0.288	22744	1298	147	1.64	4.55
湖州	1326	0.255	16738	996	119	1.92	3.74
紹興	1264	0.301	23649	866	252	2.45	4.22
舟山	780	0.268	1939	99	32	0.76	0.54
台州	784	0.358	10193	501	146	1.54	3.80

資料來源：浙江省統計局

長三角地區經濟成長中充滿了煩惱，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粗放經營與資源、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失調的新結構性危機。於是創建“節約型社會”，堅持“可持續發展”，走“循環經濟”、“綠色 GDP”之路的各種議題就擺在人們面前；其根本出路一是轉變增長方式，二是調整產業結構。要把以往只追求 GDP 數量增長的非理性價值觀用理性的科學發展觀去替代，已成為長三角地區各級政府與企業家共同的心態，在正確思想指引下，長三角地區逐漸形成一股產業結構調整的洪流。港澳台經濟在這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台灣的高技術產業、香港的現代服務業、澳門的休閒產業是長三角地區發展的弱項，可它們都是今後發展中的重點與方向。港澳台經濟快速進入這些領域是長三角地區順利完成增長方式轉換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最有力支持。港澳台的自然資源也不豐富，能源主要依靠國外輸入，而且人多地少，人地關係十分緊張；經濟發展初期也曾經歷了一段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資源短缺，生態惡化問題相當嚴重。這些情況同長三角地區極為相似，港澳台治理、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與方法，正是我們需要學習、借鑒的地方。

亟力推進先進製造業基地

中國是製造業大國，2004 年外貿總出口額中，工業製成品出口超過了 90%。長三角地區又是大陸製造業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裝備製造業，蘇南浙北的輕型製造業都領先於國內，而且也成為各自的支柱產業，如上海裝備製造業的產值在去年已達 6000 億以上，占了全市工業總量的近一半。龐大的製造業，在長三角地區空間上是以千餘個開發區、工業區以及近百個強鎮為載體的，幾萬家企業在這些地區集聚，形成了無數個製造業基地。

長三角的製造業基地上一般集合的是中小型企業，規模小、數量多，但產業上各具特色，以其優勢產品在市場上參與競爭。高密度相同產業集聚在一定

區域內，會形成企業“簇群”，產生“簇群”效應。國外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說過，“簇群”一旦形成就會出現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這個循環能促進它的發展。具體表現在它們群體規模的經濟效益上，產品門類多、價格低，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多的選擇餘地；企業之間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組織費用與其他一些公共成本減少。

但這個“簇群”還存在嚴重的缺陷，它們個體規模小、產品技術含量低，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產品的數量擴張來競爭。這些低端產品的附價值不高，僅為 26.23%，它們經營的是產業結構演化中低層次的輕加工工業產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因此，它們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產業集群，只是相同產業中同質企業的簡單集合，缺乏產業鏈各環節的有機聯繫。除少數基地外，極大多數稱不上“先進”。

要把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演化，培養先進製造業基地與產業集群十分必要，其中關鍵之一是基地中要有龍頭企業，它以雄厚的實力、先進的技術帶動整個產業鏈，把上游、中游、下游產品有機地組合起來。其二，是要有核心技術與核心產品，這有賴於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缺乏創新能力的企業是沒有生命力的。

在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期，科技進步節奏相對較慢、產品更新周期也相對較長，因此依靠技術引進模仿創新取得的後發效應很顯著。在 21 世紀的今天，情況完全不同，新科技革命導致科技進步節奏加快、產品更新周期大大縮短，依靠科技力量、自主創新取得的先發效應要遠遠超過前者。引進與模仿在改革開放後我們也經常採用，至今也仍當作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策略手段。但執行的效果不佳，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地區也走過這條路，它們既引進，又創新；而我們是只引進，不創新，於是就不斷地引進，不斷地付出高代價。而且還產生了負面效應，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自主創新的步驟。

不久前剛結束的“兩會”中盛傳過兩個典型的案例，大陸去年製造了全球 DVD 產量 8000 萬台中的 6500 萬台，每出口一台售價 32 美元，付給外國人專利費 18 美元，成本 13 美元，中國企業每台只賺了 1 個美元。一台售價 79 美元的 MP3，國外專利費需要 45 美元，成本要 32.5 美元，中國企業的利潤只有區區的 1.5 美元。觸目驚心的事實還在繼續，製造業大國只是“加工中心”，而非“製造中心”，沒有原創力量的製造業不可能成為中心。

如何營造先進性成爲我國製造業成敗的關鍵，依靠低質、低價的產品出口，會受到國際市場飽和的局限，也會引發輸入國同類廠商的對抗，匈牙利“焚鞋”事件就是一例。只有依靠企業內生力量，在政府引導下完成產業升級、增強產業的先進性與產品的技術含量。但港澳台企業外力的加入會縮短這個過程，蘇州昆山 IT 產業的迅速崛起就是一個典型的樣板，在大陸投資的 1/10 台資投資於昆山，有 1500 多家台商在此開業，其中約有 500 家爲 IT 企業，台灣 10 大筆記本電腦廠商中的 6 家在此落戶；同時在 IT 產業的園區範圍內，幾乎所有的部件可以買到，產業鏈十分完整。這樣具有原創力先進製造業基地在大陸不多，希望以此爲開端，開拓更多的類似基地。可惜現在大陸引進台灣先進科學技術受到台灣當政者政治因素干擾太多。香港在工業領域也缺少創新能力，需要同大陸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提高企業的先進性程度。

大力營造現代服務業

大陸 GDP 增長速度全球首屈一指，可是服務業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沒有現代化服務業的支撐，工業現代化難以順利實現，三資產業結構的比重調整也難以同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相一致。一個國家經濟愈發達，服務業在 GDP 總量中的比重愈高，三資產業的排序應該是“三二一”，大陸從 1991-2002 年服務業產出所占比重由 33% 上升到 34%，12 年中只增加了 1 個百分點，2003 年還退到了 32.3%，其比重遠遠低於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47.28%。至於同世界經濟發達國家服務業普遍占 70% 以上相比，更是差距懸殊。

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也是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構建和諧社會之需要，服務業資源消耗少，污染低，產出的是清潔的 GDP；它是投入-產出效益最好的產業，可以吸納大量勞動力、緩解就業難題的產業。如果按世界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產出占 GDP 的平均值 45% 來計算，相差約 12% 左右，按 2003 年國內生產總值計算，12 個百分點的落差折合人民幣爲 1.4 萬億，這也就是大陸服務業發展的空間。

長三角地區政府對大力推進現代服務業都分別作出了規劃，採取了相應的新舉措。上海 2004 年現代服務業產出爲 3565 億元，占 GDP 比重爲 47.9%，雖遠高於全國，但卻同世界經濟發達國家指標相差甚遠。下一步的目標是力爭到 2010 年達到 7500 億元產出水平，近乎翻了一番。爲了彌補服務業發展欠高的短腿，實現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腿並舉，規劃中將全面推進服務業各領域重點發展金融及期貨市場等衍生服務，分銷貿易服務、創意產業

服務等信息服務，教育服務、會展、咨詢、中介等商務服務，並“搶佔制高點”；同時兼顧到物業管理、休閒旅遊、社區服務與文化體育服務等產業。此外，還在黃浦江、蘇州河沿岸，陸家嘴、徐彙區等地建立三大服務業集聚帶與 10 多個服務集聚區。

杭州 2004 年服務產出占 GDP 比重為 41.5%，比上海要低。爲了加大現代服務業發展力度，政府出台了《加快杭州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加快杭州現代服務業發展規劃》兩個文件，確定了 20 條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在實現跨越式發展中，重點發展 8 大門類：大旅遊產業、大文化產業、金融服務業、信息軟件業、房地產業、商貿物流業、中介服務業、社區服務業；在空間佈局上，準備建立四大功能區：旅遊休閒功能區、中心城區綜合功能區、物流功能區、生產性服務功能區。在政策層面上，放寬市場准入，堅持“非禁即入”，爲鼓勵內外資進入，在用地、稅收、水電等方面給予優惠。在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在 2010 年城區實現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占 GDP 的 50% 左右，所屬縣（市）在 2015 年達到此水平，從而初步形成“三二一”產業序列的新格局。

港澳台都是現代服務業發達地區，在長江三角洲發展現代服務業中可以大展身手，可以通過合作、合資的方式進入，也可以採取獨資的方式，獨立運作，尤其歡迎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服務公司進入。

放眼休閒產業發展

休閒時間的有無、長短是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相聯繫的，如果人們爲了生存要付出全部勞動時，自然不會出現休閒時間。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加快，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勞動生產率飛速提高，於是爲生存付出的必要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剩餘勞動時間即休閒時間則不斷增加。所以休閒時間的出現與增加是同人類文明進步聯在一起的。人們可以在休閒時間中得到工作時間中感受不到的身心愉悅，而這種享受又會反過來調動人的積極性，轉化爲創造社會財富的精神力量。

爲了讓人們充分享受休閒時間，提供休閒所需要的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便會源源不斷產生，由此產生了休閒產業。從休閒產業的本質來說，它應當歸屬現代服務業；就休閒物質產品來說，它又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相關。當代休閒產業已成爲拉動內需的重要部門，它創造財富，提供就業機會，又以較高的文化內含、道德境界滿足了人們不斷增大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我們在

這裏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產業來論述，主要強調的是它已成為當代不可或缺的部門，其發展前景異常廣闊。

休閒產業的發展，一是需要有物質條件，長三角地區南翼的蘇州、無錫、鎮江、揚州，北面的杭州、嘉興、湖州、舟山都是全國著名的休閒旅遊勝地，長三角地區擁有的現代生產力又會創造出各種新穎的休閒產品；二是需要有創意能力，長三角地區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會聚，素質高，他們可以在文化藝術、電影電視、廣播出版以及計算網絡各領域創造出嶄新的創意產品。杭州當今一方面凸出“休閒之都”，另一方面又打造“動漫之都”，雙管齊下，正是符合這個形勢的。休閒產品，特別是創意產品，投入少、產出大，是一個高技術、高附價值的產業。

香港、台灣、澳門都是東南亞地區乃至世界的休閒天堂，其產值在全部 GDP 中占了很大比重，無論在開發休閒產業的經驗上，提供休閒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上都是大陸無可比擬的，它們強大的創意能力更值得我們參照學習。隨著大陸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們的休閒時間不斷增多，港澳台投資商要放眼未來，及早介入休閒產業，前途無限。

我們期望的是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台攜起手來，在世界經濟形勢不斷變幻之際，與時俱進，合作雙贏。